

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挑战吗? *

□胡 联 汪三贵

摘要:精准识别建档立卡是精准扶贫的前提,但建档立卡仍存在瞄准偏差的问题。本文基于乌蒙山片区贫困村抽样调查数据,从精英俘获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这一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精英农户仍可以成为建档立卡户。(2)云贵川60个贫困村建档立卡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精英俘获率为25%;建档立卡瞄准失误率为33%,其中精英俘获对瞄准失误的贡献率为74%,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严峻挑战。(3)村干部任期过长是影响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重要因素。村干部任期没有限制的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限制村干部任期、让村民有效参与到贫困识别、引入微观层次的第三方监督和完善村级治理是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完善有较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精准扶贫 建档立卡 精英俘获 村干部任期

一、引言

有限扶贫资源如何准确瞄准贫困农户是反贫困理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实施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方略。精准识别建档立卡是精准扶贫的前提。从2000年起新疆率先尝试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到2014年4月国务院要求在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建档立卡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即便在全国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仍然发现2015年广西马山县扶贫对象中有2454人购买了汽车,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①。不少研究发现,很多建档立卡户纯收入超过贫困标准,建档立卡存在较大瞄准误差(汪三贵,2015),建档立卡首先满足具体执行者(村干部)的利益,一个贫困村所有村干部和8个屯长的家庭都是建档立卡户(李玉刚,2015)。但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我国建档立卡存在瞄准偏差的原因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一些研究表明,非贫困群体往往可以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经济优势来获取有利于自身的福利服务政策(Jha et al., 2009),村级行政负责人更有可能获得发放给穷人的定量福利卡(Besley et al., 2012)。在孟加拉国食品教育计划,存在精英俘获现象(Galasso et al., 2005)。在坦桑尼亚,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发放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村干部的家庭获得了60%的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L. Pan and L. Christiaensen, 2012)。在低收入国家的公共福利项目中受益人识别存在普遍的精英俘获现象,项目的受益人识别及过程受到基层地方政府精英俘获严重影响(Sitakanta Panda, 2015)。国外研究表明,精英俘获是扶贫资源难以到达目标人口的重要原因,这为我们分析建档立卡瞄准偏差的原因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扶贫办在2014年对乌蒙山片区三省六县60个贫困村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精英俘获视角深入分析建档立卡瞄准误差的原因。与以往文献相,本文的主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精英俘获视阈下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完善研究”(项目编号:16BJL107)的资助。

要贡献可以归结如下：(1)通过 probit 模型发现精英农户仍可以成为建档立卡户。(2)衡量了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和精英俘获对建档立卡瞄准失误的贡献率。笔者推导了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计算公式，通过计算发现我国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率为 0.25，即 100 名建档立卡名额有 25 户被精英农户占有。建档立卡瞄准失误率为 33%，精英俘获对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瞄准失误的贡献率为 74%，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严峻挑战。(3)通过面板 tobit 模型发现贫困村村干部任期过长是影响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重要因素。限制村干部任期，完善村级治理是我国真正实现精准扶贫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政策建议的一个创新。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完善有较大借鉴意义。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研究综述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建档立卡中精英俘获的分析，第五部分是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影响因素分析，第六部分是机制分析，第七部分是政策含义，第八部分是本文总结。

二、相关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2000 年，新疆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尝试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到目前为止，建档立卡已经有 15 年的历史了。建档立卡的目的是要精准扶贫，但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来看，建档立卡存在较大的瞄准误差。从我国建档立卡实践来看，审计署调查发现 2015 年广西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 3119 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 2454 人购买了 2645 辆汽车，439 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这些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便是较为典型的农村精英。

从理论研究来看，汪三贵等(2015)对云贵川三省 60 个村调查发现，2013 年建档的农户中 40% 的农户收入高于贫困线，而在非建档的农户中 58% 的农户收入低于贫困线。李玉刚(2015)发现精准扶贫建档立卡首先满足具体执行者(村干部)的利益，而村里贫困农户不能认定成贫困户。许汉泽(2015)认为，自上而下的贫困指标分解遭遇乡村熟人社会的挑战，精准扶贫仍然难以精确确定贫困户。精准扶贫面临“越精准越不准”的悖论

同时，国内外的精英俘获研究为建档立卡瞄准误差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精英俘获

(elite capture)的概念最早是在经济学中提出，而后进入到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发展学等领域。国外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Olson(1965)和 Peltzman, S.(1976)的“利益集团俘获”范式。JJ Laffont 等(1991)和 P. Bourdieu(1996)等学者较早开始了精英俘获的研究。关于精英俘获的定义，Diya Dutta(2009)的定义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精英俘获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本来是为多数人而转移的资源却被少数一些人占有，这些少数人通常是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强势群体。

国内精英俘获研究起步较晚，如温铁军等(2009)认为，在新农村建设资源分配中精英农户得益多，多数小农被“客体化”和边缘化。吴新叶(2010)认为精英俘获现象有两个层面：一精英控制了民间组织并影响民间组织发展的现象；二外生型资源对精英的控制，进而影响民间组织运行的现象。温铁军等(2012)随着大量农贷资源反哺农村，精英率先求偿、优先受益的利益要求大量侵蚀公共利益空间。李祖佩等(2012)认为各种乡村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共同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村庄公共利益空间。邢成举和李小云(2013)认为，由于精英俘获的存在，扶贫资金和项目的利益绝大部分为社区或是村庄内的精英获取。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问题须在克服精英俘获现象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决。邢成举(2014)分析了低保评选过程中的精英俘获，并从乡村社会内的权力结构、制度规定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研究了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温涛等(2016)发现，非贫困县收入较高的精英农户获得大量农贷资金，而一般农户难以获得农贷资金。国外学者如 JP Platteau(2004)发现在西非，当地的精英控制了社会基金的支出。Galasso 等(2005)发现，在孟加拉国食品教育计划，存在精英俘获现象。Jha 等(2009)认为非贫困群体往往可以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经济优势来获取有利于自身的福利服务政策。L. Pan 和 L. Christiaensen(2012)发现，在坦桑尼亚，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发放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Sitakanta Panda(2015)认为在低收入国家的公共福利项目中受益人识别存在普遍的精英俘获现象。

对于建档立卡存在瞄准偏差的问题，精英俘获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所以本文提出了第

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精英仍然有可能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农村基层治理一直是我国反贫困治理的一个难点。审计署对2010~2012年财政扶贫资金审计查出的143名违法人员之中,其中60%为乡村干部。

从理论研究来看,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04)的研究报告显示,在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必要支持的情况下,贫困群体往往难以从政府的公共服务中获益。L. Pan和L. Christiaensen(2012)发现,在坦桑尼亚,村干部的家庭获得了60%的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Besley等(2012)发现村级行政负责人更有可能获得发放给穷人的定量福利卡。Sitakanta Panda(2015)认为公共福利项目的受益人识别及过程受到基层地方政府精英俘获严重影响。Kwadwo Adusei-Asante等(2016)发现完全依靠精英管理的社区项目容易发生精英俘获现象。唐丽霞、罗江月和李小云(2015)认为,由于村庄空心化,当前精准扶贫机制中村两委和留在村庄的精英群体的力量过强,这为扶贫资源的乡村精英俘获提供了条件。李玉刚(2015)发现一个贫困村所有村干部和8个屯长的家庭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胡联等(2015)发现,贫困村互助资金存在精英俘获,每100个互助资金使用者中有31个名额被精英占有。管理机构中村干部比例越高,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越高。许汉泽(2015)发现,在基层管理中,村干部有自己的行动策略,对于这

些自上而下的外部资源,村干部倾向于分配给与自己的亲友和关系好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英俘获现象是由村干部导致的。所以如果研究假说1被证实成立,本文提出了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2:村干部是影响建档立

卡精英俘获的重要因素。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是源自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扶贫办在2014年联合对乌蒙山片区三省六县60个贫困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次调研在县、村、农户3个层面进行。县级层面调研主要采用访谈的方式,了解县内扶贫到户项目的类型、实施方式和实施效果等。村级层面调研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了人口、基础设施、村庄扶贫项目投入状况及项目实施操作方式等信息。农户层面调研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详细调查了家庭人口特征、收入、参与扶贫到户项目等情况。调研村和农户的具体抽样方法为:每个县随机抽取5个项目村、5个非项目村。全部农户被分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非建档立卡贫困户。调研首先采取整群抽样,在每村选择建档户和非建档户均超过10个的村民小组。在确定调研村组的基础上,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村选取20个建档户和非建档户作为调研对象(计划是建档户和非建档户各10户,在实际调研中略有调整,故2012年和2013年样本建档户数不一样)。最终获得农户问卷1209份。根据研究内容和数据完整性,本文研究的总样本包括2283个农户数据。数据基本特征见表1。

其中,是否是乡村领导干部(*lead*),度量指标为

表1 数据基本特征

变量名称	标签	变量属性	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户人均纯收入	<i>perinc</i>	数值型变量	农户人均纯收入(元)	2283	2189.98	2056.89	-637.4	6908
农户家庭成员是否是领导	<i>lead</i>	分类变量	农户家庭成员是领导=1	2283	0.08	0.27	0	1
家庭人口总数	<i>pop</i>	数值型变量	人口总数(人)	2283	4.28	1.66	1	10
户主年龄	<i>a04_1</i>	数值型变量	户主年龄(岁)	2283	50.56	13.27	6	89
户主文化程度	<i>a12_1</i>	顺序变量		2283	13.01	9.35	0	52
户主健康状况	<i>a07_1</i>	顺序变量	1 健康;0 不健康	2283	0.64	0.48	0	1
户主外出打工年数	<i>a13_1</i>	数值型变量	户主外出打工年数(年)	2283	1.22	3.19	0	42
户主是否是少数民族	<i>minz</i>	分类变量	1是少数民族;0不是少数民族	2283	0.25	0.43	0	1
户主是否经常参加生产劳动	<i>a08_1</i>	分类变量	1经常参加;2偶尔参加;3不参加	2283	1.37	0.68	1	3
贫困村村劳动力数	<i>cldl</i>	数值型变量	村劳动力数(人)	120	1498.25	751.94	300	4007
村支书任职年数	<i>j08_1</i>	数值型变量	村支书任职年数(年)	120	11.3	6.75	4	22
村主任任职年数	<i>j08_2</i>	数值型变量	村主任任职年数(年)	120	10.8	5.59	2	23
姓第一大姓农户数	<i>a08a</i>	数值型变量	姓第一大姓农户数(户)	120	217.65	165.26	25	750
全村有多少户	<i>a05</i>	数值型变量	全村有多少户	120	751.48	353.87	157	1646
贫困村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i>a09</i>	数值型变量	村有多少个少数民族(个)	120	2.27	2.11	0	9
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农户数	<i>a12</i>	数值型变量	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农户数(户)	120	119.12	137.44	0	620
村耕地面积	<i>b01</i>	数值型变量	村耕地数(亩)	120	3705.7	4191.44	560	43385
全村通电话农户比例	<i>c02</i>	数值型变量	村通电话农户比例(%)	120	82.01	15.89	30	100
村到本乡镇政府的距离	<i>d01_1</i>	数值型变量	村到本乡镇政府的距离(公里)	120	10.15	7.97	1	30
年开村民代表大会数	<i>i05</i>	数值型变量	年开村民代表大会数(次)	120	5.7	3.18	1	13
年开全体村民大会数	<i>i06</i>	数值型变量	年开全体村民大会数(次)	120	5	4.12	0	20
村高中文化以上农户数	<i>f02</i>	数值型变量	村高中文化以上农户数(户)	120	120.83	102.16	7	450
村外出劳动力人数	<i>f04</i>	数值型变量	外出劳动力(人)	120	639.45	447.91	100	2054

贫困村农户户主或者家庭成员是否是乡政府、村委会干部；户主文化程度(*a12_1*)，度量指标为贫困村农户户主上学情况：0 没上学，10 学前班/幼儿，11~16 表示小学 1~6 年级，21~23 表示初中 1~3 年级，31~33 表示高中 1~3 年级，41 表示中专/职高，42 表示技校，43 表示电大中专，44 表示函授中专，51 表示大专，52 表示电大大专。

四、建档立卡中精英俘获的分析

在这一部分，笔者首先将利用 probit 模型分析农户成为建档立卡户的影响因素，验证精英农户是否可能成为建档立卡户；接着将推导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衡量公式和精英俘获对建档立卡瞄准失误贡献率的计算公式，并分别计算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和精英俘获对建档立卡瞄准失误的贡献率。

(一) 农户成为建档立卡户的影响因素

参考 Diya Dutta (2009) 和李祖佩等 (2012) 的研究，本文中建档立卡精英俘获指建档立卡户中精英占有名额的现象，这些精英分为体制性精英农户和经济性精英农户。体制性精英农户指该农户本人或者家庭成员是乡村(或以上)干部，且人均纯收入高于贫困线。经济性精英农户指该农户的人均纯收入是本县的最富裕农户(收入 5 等分分组中最高的，且是本村大姓、人均纯收入高于贫困线)。

参考 Panda (2015)、汪三贵 (2015)、李玉刚 (2015) 和胡联等 (2015) 的研究，结合本文研究问题，笔者设定以下模型分析农户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影响因素。

$$Probit(card=1) = G(a + b_1 elite_p + b_2 elite_e + \gamma X + \varepsilon) \quad (\text{模型 1})$$

其中，*card*=1 表示农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elite_p* 表示农户是否是体制性精英农户，*elite_e* 表示农户是否是经济性精英农户，*X* 为控制变量，包括户主文化程度(*a12_1*)，度量指标为贫困村农户户主上学的年数；户主年龄(*a04_1*)，度量指标为户主年龄(岁)；家庭人口总数(*pop*)，度量指标为家庭人口总数；村到本乡镇政府的距离(*d01*)，度量指标为贫困村本乡镇政府的公里数等。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我们关注的核心

变量是体制性精英农户 *elite_p* 和经济性精英农户 *elite_e* 的系数。

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但存在异方差问题，所以笔者采用了异方差的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如表 2 所示，5 个回归中实证结果较为稳定，Log likelihood 的值也比较大，正确预测百分比都在 56.77% 以上，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体制性精英农户 *elite_p* 和经济性精英农户 *elite_e* 的系数为正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体制性精英农户和经济性精英农户仍然可以成为建档立卡户。

笔者用模型 1 分别对样本中的 2012 年样本和 2013 年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根据表 3 所示，分别对 2013 年和 2012 年的子样本和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在 2012 年和 2013 年，*elite_p* 和 *elite_e* 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体制性精英农户和经济性农户可以成为建档立卡户，这也表明表 2 的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二) 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衡量

根据上文对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定义，参考 Pan 等 (2012)、汪三贵 (2007) 和胡联等 (2015) 的研究，笔者构造了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和精英俘获对建档立卡瞄准失误贡献率的计算公式。

表 2 农户成为建档立卡户的影响因素的分步回归结果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i>elite_p</i>	0.483 *** (4.54)	0.491 *** (4.56)	0.492 *** (4.56)	0.494 *** (4.57)	0.494 *** (4.58)
<i>elite_e</i>	0.605 *** (6.92)	0.574 *** (6.52)	0.579 *** (6.57)	0.584 *** (6.63)	0.584 *** (6.64)
<i>a12_1</i>	-0.015 *** (-5.07)	-0.012 *** (-3.97)	-0.011 *** (-3.70)	-0.012 *** (-3.79)	-0.012 *** (-3.79)
<i>a04_1</i>		0.006 ** (2.87)	0.004 * (1.83)	0.003 (1.31)	0.003 (1.30)
<i>pop</i>		-0.055 ** (-3.30)	-0.055 ** (-3.29)	-0.056 ** (-3.33)	-0.055 ** (-3.29)
<i>a07_1</i>			-0.152 * (-2.56)	-0.134 * (-2.10)	-0.133 * (-2.09)
<i>a13_1</i>			-0.005 (-0.59)	-0.006 (-0.71)	-0.006 (-0.70)
<i>minz</i>				-0.065 (-0.97)	-0.063 (-0.92)
<i>a08_1</i>				0.025 (0.54)	0.025 (0.54)
<i>gd</i>					-0.000 (0.16)
<i>cldl</i>					0.000 (0.19)
<i>-cons</i>	0.156 *** (3.35)	0.0528 (0.35)	0.244 (1.46)	0.271 (1.52)	0.265 (1.38)
Wald chi2	83.03	103.07	111.34	113.37	113.42
Log likelihood	-1533.279	-1521.349	-1517.803	-1517.239	-1517.22
正确预测百分比	56.77%	59.66%	60.88%	60.97%	60.93%
N	2283	2283	2283	2283	2283

注：括号内的是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是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相同。

$$EC = \left[\sum_{i=1}^N \{I_{i1}(C_i=1, IE=1, Y>Z)\} + I_{i2}(C_i=1, EE=1, Y>Z) \right] / \sum_{i=1}^N \{I_{i3}(C_i=1)\} \quad (\text{公式1})$$

$$ECR = \left[\sum_{i=1}^N \{I_{i1}(C_i=1, IE=1, Y>Z)\} + I_{i2}(C_i=1, EE=1, Y>Z) \right] / \sum_{i=1}^N \{I_{i3}(C_i=1, Y>Z)\} \quad (\text{公式2})$$

EC 表示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数值, IE 、 EE 表示是否为经济精英, N 是样本村总数, 以 i 代表各村。 I_{i1} 是一类精英俘获的标示, 如果一个农户本人或者家庭成员是乡村(或以上)干部(*lead*), 而且是建档立卡户, 而且人均纯收入(Y)高于贫困线(Z), 该指标则等于1。 I_{i2} 是二类精英俘获的标示, 如果一个农户的人均纯收入是本县的最富裕农户(收入5等分分组中最高的, 而且是本村大姓)、人均纯收入(Y)高于贫困线(Z), 而且是建档立卡户, 该指标则等于1。 I_{i3} 是农户使用建档立卡的标示, 如果农户是建档立卡户, 该指标则等于1。 EC 能够被解释为由体制性精英和经济精英导致的精英俘获程度。 本文计算贫困线标准采用国家扶贫办公布的标准, 即2012年

表3 农户成为建档立卡户的影响因素的子样本和全样本回归结果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2013样本	2012样本	全样本
<i>elite₁</i>	0.345* (2.25)	0.656*** (4.25)	0.494 *** (4.58)
<i>elite₂</i>	0.689*** (5.31)	0.488*** (4.06)	0.584*** (6.64)
<i>a12_1</i>	-0.015*** (-3.44)	-0.008 (-1.94)	-0.012*** (-3.79)
<i>a04_1</i>	0.004 (1.02)	0.002 (0.81)	0.003 (1.30)
<i>pop</i>	-0.047* (-1.98)	-0.064** (-2.68)	-0.055** (-3.29)
<i>a07_1</i>	-0.163 (-1.77)	-0.101 (-1.14)	-0.133* (-2.09)
<i>a13_1</i>	-0.004 (-0.30)	-0.008 (-0.68)	-0.006 (-0.70)
<i>minz</i>	-0.0552 (-0.55)	-0.0691 (-0.73)	-0.0634 (-0.92)
<i>a08_1</i>	0.017 (0.26)	0.033 (0.52)	0.025 (0.54)
<i>gd</i>	-0.000 (-0.11)	-0.000 (-0.04)	-0.000 (0.16)
<i>cdl</i>	-0.000 (-0.59)	0.000 (0.85)	0.00 (0.19)
<i>_cons</i>	0.357 (1.29)	0.177 (0.66)	0.265 (1.38)
Wald chi2(9)	63.12	57.72	113.42
Log likelihood	-734.288	-779.073	-1517.22
正确预测百分比	60.90%	59.85%	60.93%
N	1110	1173	2283

和2013年分别是2625元和2736元。

ECR 表示的是建档立卡精英农户在建档立卡瞄准失误人数的比率, 这表示了精英俘获对瞄准失误的贡献率。

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2012年建档立卡总户数为615户, 其中体制精英农户数为69户, 经济精英农户数为99户, 建档立卡中即是经济精英又是体制精英为15户, 体制精英在建档立卡户中的比重为0.11, 经济精英在建档立卡户中的比重为0.16, 精英俘获程度共计为0.25。 2013年建档立卡使用者总户数为588户, 其中体制精英户数为51户, 经济精英户数为95户, 建档立卡中即是经济精英又是体制精英为3户, 体制精英在建档立卡使用者中的比重为0.09, 经济精英在建档立卡使用者中的比重为0.16, 精英俘获程度共计为0.24。 包括2012年和2013年的总样本建档立卡中精英俘获程度为0.25, 这意味着每100个建档立卡使用者中有25个名额是被精英所占有。 表4的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假说1, 表明精英可以成为建档立卡户。 由此可见, 精准识别建档立卡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

再看精英俘获对瞄准失误的贡献率, 2012年建档立卡瞄准失误户数为216户, 精英户数为153, 精英俘获对瞄准失误的贡献率为0.71; 2013年建档立卡瞄准失误户数为184户, 精英户数为143, 精英俘获对瞄准失误的贡献率为0.78; 包括2012年和2013年的总样本建档立卡中精英俘获对瞄准失误的贡献率为0.74。 由此可见, 我国精准识别建档立卡中面临精英俘获的严峻挑战。

五、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影响因素

这一部分笔者将分析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影响因素, 验证假说2。 参考Pan等(2012)、汪三贵(2007)、胡联等(2015)和Panda(2015)的研究, 结合我国建档立卡的实际情况, 笔者考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影响因素有以下: (1) 贫困村村级治理因素(X_i), 本文用村支书任职年数 $j08_1$ 、村主任任职年数 $j08_2$ 、贫困村一年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i05$ 和贫困村一年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i06$ 来衡量

表4 建档立卡中精英俘获程度及对瞄准失误的贡献率

	2012年样本	2013年样本	总样本
建档立卡中体制精英户数	69	51	120
建档立卡中经济精英户数	99	95	194
建档立卡中既是经济精英又是体制精英户数	15	3	18
建档立卡精英户数总和	153	143	296
建档立卡总户数	615	588	1203
体制精英在建档立卡中的比重	0.11	0.09	0.10
经济精英在建档立卡中的比重	0.16	0.16	0.16
精英俘获程度合计	0.25	0.24	0.25
瞄准失误户数	216	184	400
建档立卡瞄准失误率	0.35	0.31	0.33
精英俘获对瞄准失误的贡献率	0.71	0.78	0.74
样本数	1173	1110	2283

(2) 贫困村村庄特点 (X_2)，本文用全村耕地面积 $b01$ 、贫困村到本镇政府所在地最近的距离 $d01z1$ 、全村电话人口比例 $e02$ 、全村高中文化程度劳动力比例 $f02$ 和外出劳动力人数 $f04$ 来衡量。(3) 贫困村村庄人口、种族特点 (X_3) 本文用贫困村高中文化程度(包括中专、技校)的劳动力人数 $e02$ 、贫困村里有少数民族个数 $a09$ 、贫困村姓该大姓的农户数 $a08a$ 来衡量、贫困村最多的少数民族户数 $a12$ 和贫困村总户数 $a05$ 来衡量。

由于贫困村精英俘获程度是一个数值介于 0 和 1 之间的受限变量，用传统的线性方法对模型直接进行回归可能会得到负的拟合值，因而本文采用处理受限因变量的面板 tobit 模型来研究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影响因素。模型设计如下：

$$EC_{it} = \delta_0 + \delta_1 X_{1it} + \delta_2 X_{2it} + \delta_3 X_{3it} + \nu_i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模型 2})$$

EC_{it} 为笔者根据精英俘获的计算公式 1 计算样本中贫困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 X_{1it} 、 X_{2it} 和 X_{3it} 是上文提到的控制变量。 δ 为待估参数向量， ν_i 表示个体的随机效应， ε_{it}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正态分布。由于本文研究数据是对 60 个贫困村的 2 年调研，故笔者采用随机效应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分析。

经检验，tobit 模型的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和同方差性，同时不存在多重共线的问题。笔者在实证分析时，不仅进行了面板 tobit 模型的分析，还报告了 ols 和混合 tobit 的估计结果。本模型实证分析使用的村级数据是 120 个，为克服样本量不大的问题，笔者在估计时均采用自助法抽样 300 次。

笔者估计了 2 个混合 tobit 模型、1 个 ols 模型和 3 个面板 tobit 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如表 5 所示。首先看面板 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rho 值代表了个体效应的方差(即组间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3 个模型的值都在 0.32~0.44 以上，说明个体效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解释了贫困村精英俘获程度的变化。3 个模型中个体效应和随机干扰项的标准差都很小，从 3 个模型的极大似然率比值可以看出，不存在个体效应的零假设被拒绝，也即拒绝了混合 tobit 模型。另外，从对数极大似然值可以看出 5 个模型的拟合优度也都较好。从 ols 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包括村支书当村干部年数 $j08_1$ 和村主任当村干部年数 $j08_2$ 等的系数与面板 tobit 模型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而且 R^2 值为 0.83，拟合程度较好。混合 tobit 模型估计

结果与面板 tobit 模型估计的结果也基本一致。

所以，进行的 6 个回归实证结果比较稳定。村支书任职年数 $j08_1$ 和村主任任职年数 $j08_2$ 的系数为正，且均在 1% 或 5%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村支书和村主任当村干部年数越长，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越高。图 1 和图 2 也直观地显示了这种关系。同时贫困村一年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i06$ 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贫困村一年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越多，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越低。

笔者进一步对样本中按年度区分的子样本分别用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我们还可以看到：村支书当村干部年数 $j08_1$ 和村主任当村干部年数 $j08_2$ 的系数为正，而且显著。对 2013 年样本的实证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贫困村到本乡镇政府的距离 $d01_1$ 的系数为正，而且显著，这表明贫困村到本乡镇政府的距离也是影响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一个因素。

表 5 贫困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tobit	tobit	ols	xttobit	xttobit	xttobit
$j08_1$	0.012*** (4.27)	0.012*** (3.55)	0.012*** (3.75)	0.013** (3.16)	0.011** (3.04)	0.011** (3.24)
$j08_2$	0.014*** (7.69)	0.013*** (6.06)	0.013*** (6.41)	0.015*** (6.41)	0.013*** (5.35)	0.013*** (4.87)
$a08a$	0.000 (1.32)	0.000 (1.37)	0.000 (1.21)	0.000* (1.99)	0.000 (1.76)	0.000 (1.56)
$a05$	0.000 (0.38)	0.000 (1.15)	0.000 (0.96)	-0.000 (-0.49)	0.000 (0.64)	0.000 (1.13)
$a09$	-0.007 (-1.44)	-0.007 (-1.20)	-0.005 (-0.90)	-0.001 (-0.19)	-0.007 (-1.61)	-0.007 (-1.30)
$a12$	-0.000 (-0.23)	-0.000 (-0.22)	-0.000 (-0.36)		0.000 (0.09)	-0.000 (-0.22)
$i05$	0.003 (0.79)	0.002 (0.51)	0.002 (0.73)		0.001 (0.35)	0.001 (0.3)
$i06$	-0.015*** (-4.75)	-0.013*** (-3.59)	-0.011** (-3.27)		-0.015*** (-5.28)	-0.013*** (-4.06)
$b01$		-0.000 (-0.70)	0.000 (-0.09)		-0.000 (-0.71)	-0.000 (-0.79)
$e02$		-0.000 (-0.24)	-0.000 (-0.11)		-0.000 (-0.48)	-0.000 (-0.27)
$d01_1$		0.001 (1.1)	0.001 (0.96)		0.002 (1.48)	0.002 (1.22)
$f02$		-0.000 (-0.86)	-0.000 (-0.88)			-0.000 (-0.98)
$f04$		-0.000 (-1.06)	-0.000 (-1.26)			-0.000 (-1.41)
-cons	0.093 (1.87)	0.109 (1.52)	0.085 (1.31)	0.0016 (0.04)	0.119 (1.67)	0.123 (1.69)
个体效应标准差				0.014	0.011	0.011
随机效应标准差				0.008	0.009	0.008
Rho				0.44	0.33	0.32
LR 检验				11.07 (0.000)	6.52 (0.005)	6.10 (0.007)
Wald chi2	553.84	567.99	670.05	226.09	560.05	631.91
对数最大似然值	106.69	108.88		98.02	111.04	111.88
R^2			0.83			
N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注：括号内的是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是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六、机制分析

我国目前村干部任职年数没有明确限制,村主任每届任期3年依据是《村民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届满换届选举可以连任。村支书由村党支部党员选产生,届满可以连任。正是这种情况,很多村庄(包括贫困村)的村主任和支书任职年数很长,有的高达20、30年。笔者认为,贫困村村干部任职年数过长,村干部对贫困村的影响也越大。

(一)村干部通过影响信息传递,导致建档立卡精英俘获发生

按照当时国家规定的扶贫标准和识别程序,建档立卡识别认定程序应该:一是户主申请关;二是小组提名关;三是入户调查关;四是集体评定关;五是张榜公示关。但调研发现贫困村并非完全按照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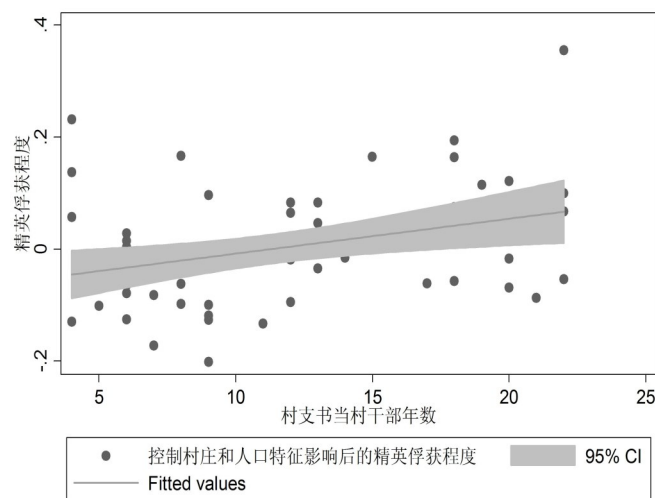


图1 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与村支书当村干部年数的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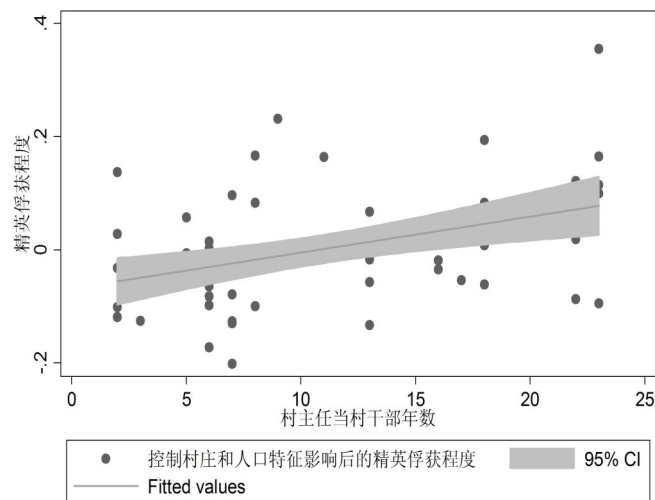


图2 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与村主任当村干部年数的散点图

程序实施。农户要成为建档立卡户,首先得自己主动申请。但调研发现很多非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当时没有知道建档立卡申请信息。在当时背景下,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是传递建档立卡相关信息的主要途径。但笔者对村干部任职年限与全体村民大会召开次数实证分析发现,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

笔者估计了4个ols结果(为克服样本量不大的问题,估计时均采用自助法抽样300次)。如表7所示,村主任任职年限*j08_2*的系数为负而且显著,这说明村主任任职年数越长,全体村民大会召开次数越少。全体村民大会召开次数越少,同样不利于建档立卡相关信息的传递。这会导致与村主任关系密切的精英农户知道信息申请,同时一些贫困农户不知道相关信息而未能申请,这样就会为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发生提供了可能。任职年限越长的村干部,对村建档立卡信息传递影响越大,最终导致的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越高。这一点与JP Platteau等(2014)^⑨的观点一致。同时,这与表5(全体村民大会召开次数*i06*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的观点也一致。

(二)村干部通过影响建档立卡的集体评定,导致建档立卡精英俘获发生

建档立卡识别认定程序有一个重要环节是集

表6 贫困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影响因素的子样本回归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2012年样本	2013年样本	全样本
<i>j08_1</i>	0.014** (2.71)	0.008 (1.78)	0.011** (2.79)
<i>j08_2</i>	0.014*** (4.36)	0.009* (2.48)	0.013*** (5.23)
<i>a08a</i>	0.000101 (0.6)	0.00024 (1.8)	0.000151 (1.64)
<i>a05</i>	0.000 (0.23)	0.000 (1.15)	0.000 (1.18)
<i>a09</i>	-0.009 (-0.89)	-0.0029 (-0.30)	-0.007 (-1.38)
<i>a12</i>	-0.000 (-0.81)	0.000 (0.45)	-0.000 (-0.20)
<i>b01</i>	-0.000 (-0.24)	-0.000 (-1.26)	-0.000 (-0.79)
<i>c02</i>	-0.000411 (-0.51)	-0.000108 (-0.13)	-0.00012 (-0.29)
<i>d01_1</i>	-0.002 (-0.91)	0.005* (2.3)	0.002 (1.25)
<i>i05</i>	0.004 (0.86)	-0.004 (-0.63)	0.001 (0.31)
<i>i06</i>	-0.014* (-2.38)	-0.012* (-2.04)	-0.013*** (-3.95)
<i>j02</i>	-0.000 (-0.55)	-0.000 (-0.89)	-0.000 (-1.10)
<i>j04</i>	-0.000 (-0.37)	-0.000 (-0.90)	-0.000 (-1.36)
<i>-cons</i>	0.146 (1.28)	0.18 (1.54)	0.123 (1.64)
对数最大似然值	51.845	64.923	111.935
Wald chi2(13)	208.36	218.83	631.91
N	60	60	120

体评定。由于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难以确定,农户申请后要经过集体评定后才能初步确定建档立卡户。调研中发现,贫困村建档立卡集体评定的是通过村干部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评定。在不少劳动力外出打工、村庄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贫困村的村民代表选举和大会的召开越来越多受到村干部(主要是村主任和村支书)的影响。首先,很多村民代表并不是村小组选举产生而是由村主任和村支书指派;其次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取决于村主任和村支书的个人意愿。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档立卡由村民代表们集体评定极易受到村干部(村主任或村支书等)象征权力的影响——一些精英农户因此而被认定为建档立卡户。

笔者对村干部任职年限与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实证分析发现,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笔者估计了5个ols结果(为克服样本量不大的问题,估计时均采用自助法抽样300次)。如表8所示,村主任任职年数*j08_2*的系数为负而且显著。这说明村主任任职年数越长,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越少,说明贫困村建档立卡集体评定极少通过集体评议来决定,大多数由村干部直接指定了。由此可见,任职年限越长的村干部,对建档立卡的集体评定影响越强,最终导致的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越高。

表7 村干部任职年数对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的影响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被解释变量: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				
<i>j08_1</i>	-0.098 (-1.13)	-0.085 (-1.01)	-0.028 (-0.30)	-0.023 (-0.28)
<i>j08_2</i>	-0.248*** (-3.59)	-0.226** (-3.00)	-0.202** (-3.04)	-0.132* (-2.11)
<i>a08a</i>		-0.004 (-1.39)	-0.003 (-1.23)	-0.002 (-0.87)
<i>a05</i>		0.001 (1.09)	0.000 (0.05)	-0.001 (-0.94)
<i>a09</i>		-0.442* (-2.55)	-0.41* (-2.47)	-0.445** (-2.58)
<i>a12</i>		-0.003 (-1.52)	-0.002 (-1.11)	0.000 (-0.12)
<i>b01</i>			0.000 (1.3)	0.000 (1.39)
<i>c02</i>			-0.047* (-2.16)	-0.045* (-2.19)
<i>d01_1</i>			-0.099* (-2.12)	-0.061 (-1.57)
<i>f02</i>				0.014*** (3.55)
<i>f04</i>				0.001 (1.6)
<i>-cons</i>	8.79*** (10.81)	9.756*** (8.53)	13.27*** (6.30)	9.954*** (5.26)
<i>r</i> ²	0.264	0.327	0.415	0.512
<i>N</i>	120	120	120	120

(三)村干部通过与上级部门的博弈影响,导致建档立卡精英俘获发生

建档立卡户初步确定后,有的县扶贫办复查。复查中会发现有的建档立卡户明显不符合标准。按正常的程序,不符合标准的建档立卡户会被取消资格。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扶贫办往往将没有评定为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重新认定为建档立卡户,而一般不会取消不符合标准的精英建档立卡的资格。原因在于如果精英建档立卡的资格被取消,后续建档立卡工作和扶贫项目的实施都会因得不到村主任或村支书的支持而难以开展。村干部正是通过与上级部门的博弈,使得与村干部关系密切的精英农户成为建档立卡户,从而导致建档立卡精英俘获发生。任职年数越长的村干部,对贫困村影响越大,与上级部门的博弈能力也越强,最终导致的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越高。

这种博弈难以在数据上直接体现,却是在调研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如笔者2014年在贵州大方县和平村调研发现,和平村建档立卡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一些深度贫困农户无法成为建档立卡户,而一些与村主任村支书关系好的精英农户成为了建档立卡户。这些情况反映到县扶贫办,最终结果是将一部分深度贫困农户补充建档立卡户,但原来的精英农户并没有取消。

表8 村干部任职年数对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的影响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全样本	全样本	2013年样本	2013年样本	2013年样本
被解释变量: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					
<i>j08_1</i>	-0.045 (-0.50)	-0.037 (-0.41)	-0.068 (-0.74)	-0.029 (-0.32)	-0.022 (-0.26)
<i>j08_2</i>	-0.141* (-2.12)	-0.144* (-2.00)	-0.310*** (-4.51)	-0.307*** (-4.36)	-0.329*** (-4.44)
<i>a08a</i>	0.000 (0.05)	0.000 (0.09)	-0.000 (-0.09)	-0.000 (-0.03)	0.000 (0)
<i>a05</i>	-0.001 (-0.88)	0.000 (-0.07)	-0.001 (-1.19)	-0.001 (-1.05)	-0.00 (-0.40)
<i>a09</i>	0.007 (-0.05)	-0.048 (-0.29)	0.035 (0.2)	0.045 (0.24)	0.029 (0.15)
<i>a12</i>	-0.000 (-0.19)	-0.000 (-0.17)	-0.004 (-1.73)	-0.004 (-1.56)	-0.004 (-1.77)
<i>b01</i>	-0.000 (-0.19)	-0.000 (-0.24)		0.000 (0.07)	-0.000 (-0.04)
<i>c02</i>	-0.017 (-0.92)	-0.016 (-0.87)		-0.029 (-1.45)	-0.029 (-1.39)
<i>d01_1</i>	0.019 (0.43)	0.021 (0.45)		-0.051 (-1.06)	-0.053 (-1.12)
<i>f02</i>		0.001 (0.2)			-0.002 (-0.36)
<i>f04</i>		-0.001 (-1.16)			-0.001 (-0.95)
<i>-cons</i>	9.631*** (5.75)	9.408*** (5.03)	11.05*** (12.21)	13.52*** (8.15)	13.95*** (7.45)
<i>r</i> ²	0.133	0.144	0.595	0.621	0.628
<i>N</i>	120	120	60	60	60

七、总结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精准扶贫理念实施后,通过 probit 模型发现精英农户仍可以成为建档立卡户;(2)通过计算发现,60个贫困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率为0.25,即100名建档立卡名额有25户被精英农户占有。建档立卡瞄准失误率为33%,精英俘获对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瞄准失误的贡献率为74%,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严重挑战;(3)贫困村村干部任职年数越长,贫困村一年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越少,贫困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率越高。

本文的重要发现在于:一是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严峻挑战;二是村干部任期过长是建档立卡精英俘获产生的重要原因。为实现2020年农村减贫目标,我国每月需减贫100万人,扶贫开发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但即便在全国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仍存在“帮富不帮穷”的现象。本文研究结果显示,2012年和2013年云贵川60个贫困村建档立卡都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这不仅是滥用有限而宝贵的扶贫资源,也很不利于我国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同时,村干部任期没有限制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揭示了农村基层治理现状与精准扶贫目标之间的矛盾,研究结论对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完善有较大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采取让村民有效参与到贫困人口的识别程序、引入微观层次的第三方监督、限制村干部任期、完善村级治理等政策,来应对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严峻挑战,实现真正的精准扶贫。这对完成在2020年在全国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八、政策含义

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建档立卡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实证研究显示云贵川60个贫困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率为0.25,其中精英俘获对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瞄准失误的贡献率为74%,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严峻挑战。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贫困村村干部任职年数越长,贫困村一年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越少,贫困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率越高。

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十章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规定,“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原则上应当任满一届,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十年的,必须交流;在同一职位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这个条款实际上明确限制了干部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但是村级干部的任期限制问题却被忽视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国家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规定了村级领导班子一届任期3年,并没有规定同一个村民在村级主要领导职位上不得超过多少个任期的限制。这导致了很多村主任和村支书任期达20、30多年之久。

长期任职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村支书村主任已经变成当地的“土皇帝”,他们对村里扶贫资源分配产生巨大影响。笔者认为,应该在1999年2月13日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二章“组织设置”或第六章“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适当地方增加限制村支部书记任职不得超过3个任期(9年)的限制,同时应当在2010年10月28日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章“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第十一条增加一款限制村民委员会主任连选连任不得超过3届(9年)的规定。通过对村干部的任期限制,减少精英俘获,有利于精准扶贫的有效实现。

此外,由于本文受到调研数据的限制,只重点分析了贫困村村干部任职年数对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影响机制。但无论是从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还是联系中国的具体实践,贫困村村干部任职年数过长其实是我国村级治理不完善的一个缩影。在我国扶贫实践领域一直存在“由于村级治理状况不同,相同的扶贫项目在不同的村有不同的效果”的现象。现在本文发现,由于村级治理因素,在不同村存在不同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程度现象。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是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虽然建档立卡已实施一段时间,但精准扶贫是在2014年才在全国普遍实施。尽管如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精准扶贫机制完善仍有重要意义。2014年,为保障精准扶贫,全国各省、市、县三级共派出了以扶贫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工作队超过10万个,驻村帮扶干部40万人。但是审计署调查仍然发现2015年广西马山县扶贫对象买汽车事件。这些扶贫对象的认定是按照规定程序,经过贫困村由村干部召集

的村代表民主评议初步认定的。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贫困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案例。所以笔者认为,没有村级治理的完善,依靠工作队和驻村帮扶干部仍难以避免精英俘获,实现真正的精准扶贫。

因此笔者认为,除了限制村干部任期外,政府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用参与式识别的办法,让村民有效参与到贫困人口识别程序。正如Ryan Sheely(2015)认为通过有意义的参与改变当地的权力关系能够减少精英俘获。二是引入微观层次的第三方监督。当前,我国在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考核引入了第三方考核。但目前精准扶贫第三方监督还没有有效建立起来。在第三方评估中,“第三方”的“独立性”被认为是保证评估结果公正的起点,而“第三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则被认为是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的基础。当前我国各种智库正处在加速发展之中,笔者认为政府可以以委托课题等形式鼓励各种智库、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对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做出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可以采取专项调查、抽样调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精准扶贫考核指标进行评估,使各项脱贫数据更加可靠、更加公正。第三方评估报告可以以上报相关政府部门和公开发布的形式,以督促精准扶贫机制的完善。同时政府也应积极创建有利于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独立发展的行政和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胡联,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责任编辑:程漱兰)

注释

①参见审计署:《广西马山县2454名扶贫对象买2645辆车》,http://news.ifeng.com/a/20151008/44796959_0.shtml,2015。

②Platteau等(2014)认为信息传播扭曲会导致精英俘获。

参考文献

(1)胡联、汪三贵、王娜:《贫困村互助资金存在精英俘获吗》,《经济学家》,2015年第9期。

(2)李玉刚:《利益、原因与困境——J村精准扶贫实践》,《第十一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论文集》,2015年。

(3)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探索》,2012年第5期。

(4)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5)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6)汪三贵、Albert Park、Shubham Chaudhuri、Gaurav Datt:《中国新时期农村扶贫与村级贫困瞄准》,《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7)吴新叶:《社区民间组织成长中的精英捕获:问题与对策——以社会管理为视角的分析》,《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8)温铁军等:《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7期。

(9)温涛、朱炯、王小华:《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

(10)温铁军、杨帅:《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理论探讨》,2012年第6期。

(11)邢成举:《乡村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2)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9期。

(13)许汉泽:《扶贫瞄准困境与乡村治理转型》,《农村经济》,2015年第9期。

(14)Besley, T., Pande, R. & Rao, V., 2012, “Just Rewards? Local Politics and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outh Ind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6, pp.191~216.

(15)Diya Dutta, 2009, “Elite Capture and Corruption: Concepts and Definition”,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16)Galasso, E. & Ravallion, M., 2005, “Decentralized Targeting of an Antipoverty Progra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pp.705~727.

(17)Jha, Raghendra; Bhattacharyya, Sambit; Gaiha, Raghav and Shankar, Shylasti, 2009, “‘Capture’ of Anti-poverty Programs: An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Program in India 2009”,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4), pp.456~464.

(18)JP Platteau, 2004, “Monitoring Elite Capture in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5(2), pp.223~246

(19)JJ Laffont and J. Tirole., 1991,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 Theory of Regulatory Capt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pp.1089~1127.

(20)Kwadwo Adusei-Asante and Peter Hancock, 2016, “Does Deference Enable Elite Capture? Evidence from a World Bank Community-Based Project in Ghana”, *RJSH*, Vol. 3, pp.49~58.

(21)L. Pan, L. Christiaensen, 2012, “Who is Vouching for the Input Voucher? Decentralized Targeting and Elite Capture in Tanzania”, *World Development*, 40(8), pp.1619~1633.

(22)M. Olson,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3)Peltzman, S., 1976, “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9, pp.211~240.

(24)Platteau, Jean-Philippe; Somville, Vincent; Wahhaj, Zaki, 2014, “Elite Capture Through Information Distortion: A Theoretical Essa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6, pp.250~263,

(25)P. Bourdieu, 1996,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Oxford: Polity Press.

(26)Ryan Sheely, 2015, “Mobilization, Participatory Planning Institutions and Elite Captur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Rural Kenya”, *World Development*, 67, pp.251~266.

(27)Sitakanta Panda, 2015,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lite Capture in a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me in Indi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1, pp.50~65.

(28)World Bank, 2004, *200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